

九十年代中國鄉鎮企業調查



馬戎 黃朝翰
王漢生 楊沐 合編

APL857565-7

九十年代
中國鄉鎮企業調查

主 編

馬 戎 黃朝翰
王漢生 楊 沐

牛津大學出版社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New York
Athens Auckland Bangkok Bombay
Calcutta Cape Town Dar es Salaam Delhi
Florence Hong Kong Istanbul Karachi
Kuala Lumpur Madras Madrid Melbourne
Mexico City Nairobi Paris Singapore
Taipei Tokyo Toronto
and associated companies in
Berlin Ibadan
Oxford is a trade mark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irst published 1994

九十年代
中國鄉鎮企業調查
主編
馬戎 黃朝翰
王漢生 楊沐

© 牛津大學出版社 1994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香港鰂魚涌英皇道 979 號太古坊和域大廈十八樓
ISSN 0 19 586609 6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in writing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ong Kong) Ltd. Within Hong Kong, exceptions are allowed in respect of any fair dealing for the purpose of research or private study, or criticism or review, as permitted under the Copyright Ordinance currently in force. Enquiries concerning reproduction outside these terms and in other countries should be sent to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ong Kong) Ltd. at the address below

This book is sold subject to the condition that it shall not, by way of trade or otherwise, be lent, re-sold, hired out or otherwise circulated without the publisher's prior consent in any form of binding or cover other than that in which it is published and without a similar condition including this condition being imposed on the subsequent purchaser

版權所有，本書任何部分若未經版權持有人允許，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襲或翻印

Printed in Hong Kong
Published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ong Kong) Ltd.
18/F Warwick House, Tai Koo Place, 979 King's Road, Quarry Bay, Hong Kong

社會與思想叢書緣起

歷史悠久的牛津大學出版社從一九九二年起開始出版中文書籍。這或許預示着：中文這一為十多億人所使用的語言文字，在世界文化和學術的發展中將會日益取得其應有的地位。現在，牛津大學出版社又決定出版「社會與思想叢書」，俾更有系統地積累有價值的中文學術著述和譯述，我們希望，這對於中國學術文化的發展，將會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

「社會與思想叢書」將首先着重於對中國本土社會與本土思想的經驗研究和理論分析。誠如人們今天已普遍意識到的，晚近十餘年來中國所發生的深刻變革，並非僅僅只是相對於一九四九年以來甚至一九一一年以來而言的變遷，而是意味着：自秦漢以來既已定型的古老農業中國，已經真正開始了其創造性自我轉化的進程。這一歷史巨變已經將一系列重大問題提到了中外學者的眼前，例如，鄉土中國的這一轉化將會為華夏民族帶來甚麼樣的新的基層生活共同體？甚麼樣的日常生活結構？甚麼樣的文化表達和交往形式？甚麼樣的政治組織方式和社會經濟網絡？所有這些都歷史性地構成了「中國現代性」的基本課題，同時恰恰也就提供了「中國傳統性」再獲新生的歷史契機。可以說，當代中國的這一歷史變革已經為中國當代學術文化的突破性發展提供了充分的歷史可能與堅定的經驗基礎，因為它一方面使人們已能立足於今日的經驗去思考中國的未來，同時也已為人們提供了全新的視野去再度重新認識中國的歷史、中國的文明、中國的傳統性。有鑒於此，本叢書將不僅強調對當代中國的研究，同時亦重視對中國歷史的研究，以張大「中國現代性」的歷史文化資源。

「社會與思想叢書」的另一方面則是同時注重對西方社會與思想，以及其它非西方社會與思想的研究。如果說，晚近十餘年來的中國變革標誌着「中國現代性」的真正歷史出場，那麼，七十年代以來西方最引人注目的現象無疑莫過於對「西方現代性」歷史形成的全面重新檢討：在經濟領域，所謂「福特式大生產方式」的危機不僅促發對「後福特時代生產」的思考，而且首先迫使人們重新檢討「福特式生產」的歷史成因及內在闕失；在政治領域，西方現存體制與民權運動以來民主發展的尖銳張力，已重新激發西方近代以來「自由主義 v.s. 共和主義 (Republicanism)」這一基本辯論；在文化領域，形形色色的後現代主義不但已全面動搖近代西方苦心營構的文化秩序和價值等級，而且更進而對「西方傳統性」本身發起了全面的批判。所有這些都提醒人們：自上世紀末以來一直在學習西方的中國人，今天已不能不同樣全面重新檢討中國人以往對西方的理解和認識。因此，本叢書將不僅包括對當代西方的研究，而且更強調對西方歷史傳統的重新認識，特別是西方傳統內在差異性的研究。

本叢書定名為「社會與思想」，自然表達了一種期望，即：對社會制度層面的研究與對思想意識層面的研究，應該日益結合而不是互不相干。從學科的角度講，亦即希望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與人文及哲學領域的研究，能夠相互滲透，相互促進。通過多學科的合作與跨學科的研究去深入認識中西現代性與中西傳統性，以往那種僵硬的「傳統 v.s. 現代」、「中國 v.s. 西方」的二元對立思維方式或將會真正打破，代之而起的是人類對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的同等尊重和相互理解。中文學術世界為此任重而道遠！

甘 陽

一九九三年十月

序言

吳慶瑞

新加坡東亞政治經濟研究所主席、新加坡前副總理

世界上沒有那一個國家如今天的中國那樣，在農業人口中發展出那麼多的企業。這些從小集鎮中，甚至村莊中開始的企業成了中國驚人的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呢？

在 1986 年和 1987 年，世界銀行第一次組織了大規模的對鄉鎮企業的研究，通過五組精心設計的問卷，在四個選樣的地點，收集了重要的數據。

本書所進行的研究，使用的是另一種方法，即案例研究技術。研究的重點放在這些農村企業的背景資料上，如它們是怎樣建立這些企業的？怎樣克服一個新企業從開始到成功所必然碰到的無數困難？和國有企業不同，鄉鎮企業是在激烈的競爭環境中運行，這些嚴峻的環境中的倖存者，必然會有一些特殊的成功之處，這是本書各章所要表述清楚的重點。

幸運的是，我們組織了一個高質量的調查研究小組，這些成員來自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要在若干個選擇的鄉鎮中進行兩個多月的調查研究，需要調研人員有很強的專業經驗和學術專長。

鄧小平先生在 1987 年時曾說：鄉鎮企業在沒有國家幫助下實現了大發展，是他所沒有預料到的。實際情況是，中國政府設計來用於解決其他問題的各項政策的結合、無意地促進了

序言

鄉鎮企業的發展。首先，嚴格的戶口登記制度，阻止農村居民向城鎮移動，把農村剩餘勞動力保存在農村地區。其次，在大學教育和科研機構中，重視對科學知識和工程技術的追求，給全國提供了範圍廣泛的基本生產技能。第三，在過去幾十年中，多個機械工業部的大發展，使中國形成了一個雖然不那麼先進，但通用的生產能力。如果這三個基本條件中的任何一個不存在，鄉鎮企業就會像大部分發展中國家的農村企業那樣，不可能在它們所在的地區獲得技術和生產產品，人們就會湧向大城市去尋找工作。第四，由於長期實行計劃經濟造成改革初期的短缺經濟，使處於開始時期的鄉鎮企業具有生產各種產品的廣泛選擇。

當然，我們不能宣稱這種小規模的研究能代表中國各地的所有鄉鎮企業。我們調查的企業所在的江蘇省和山東省，是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但鄉鎮企業遍佈全國各地，因此，如果出現許多鄉鎮企業不具備本書中所描繪的特點的現象，也是不足為怪的。如果有可能在內地一些省分進行相類似的研究，將是很有幫助的。

最後須要解釋的是，我們沒有公開這些企業的確實地點、它們的名字、和我們所調查的職工的名字。讀者在讀完本書各章後，將會發現其理由。鄉鎮企業的高層主管在追逐利潤中，毫不猶豫地違反政府規定，甚至進行非法活動。企業職工在和我們相互信任的基礎上，向我們的調查人員反映了這種真實情況。這也可表明在中國現有的企業文化中，遵紀守法似乎並不是很重要的。

九十年代中國鄉鎮企業調查

馬戎 黃朝翰 王漢生 楊沐合編

研究中國鄉鎮企業發展歷史與運行機制，是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 (ISA) 與新加坡東亞政治經濟研究所 (EAPE) 的一個合作研究項目。本書所收的十個調查個案，是這個研究項目的部分成果。

七十年代末期至九十年代初，短短十多年中國鄉鎮企業的總產值在國民生產總值中所佔的分額，由 7.2% 增加至 32.2%。鄉鎮企業總產值從 1,000 億元到 1991 年 11,000 億元，只用了 8 年時間。發展勢頭凌厲，在整體的國民經濟中佔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

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體制改革不同，中國的改革策略強調農村的經濟體制改革，先農村後城市。鄉鎮企業的蓬勃發展，使人聯想到：中國和前蘇聯及東歐國家在改革前具有相似的所有制形式，為甚麼鄉鎮企業卻只在中國發展起來？鄉鎮企業在改革中又有何戰略意義？

經過八十年代中後期的高速發展，以及 1989 年後幾年的調整階段，鄉鎮企業在九十年代再度呈現高速發展的趨勢。

馬戎 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研究員

黃朝翰 新加坡東亞政治經濟研究所所長

王漢生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楊沐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經濟學博士

社會與思想叢書

林青松 伯德編

中國鄉鎮企業的歷史性崛起

馬戎等編

九十年代中國鄉鎮企業調查

劉世定

雙重稅制下的鄉鎮企業財政

柳可白

鄉鎮企業與國營企業的合作與競爭

石秀印

鄉鎮企業領導與職工的激勵機制

王漢生

鄉鎮企業的承包及與鄉村政府的關係

唐文方

中國鄉鎮企業的職工參與

石秀印

國有體制下生活的人們

社會與思想叢書

主 編

甘 陽 芝加哥大學社會思想委員會

編輯委員

王紹光 耶魯大學政治學系

王漢生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

周其仁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歷史學系

崔之元 麻省理工學院政治學系

陳 來 北京大學哲學系

張隆溪 加州大學河濱分校文學系

劉小楓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目 錄

序 言	吳慶瑞	ix
導 言	馬戎	1
A 鎮漁具集團公司	丁元竹	32
A 鎮醫用高分子製品總廠	馬戎	67
B 鎮內燃機配件廠調查	劉小萌	93
C 鎮××技工學校第三實習分廠	于長江	130
E 鎮第二呢絨服裝廠調查	劉小萌	165
H 鄉絲織廠	劉世定 柳可白 石秀印 王漢生	196
I 鎮 A 縣煉油廠調查	柳可白 石秀印 王漢生 劉世定	249
J 鎮通信電纜廠	王漢生 劉世定 柳可白 石秀印	300
K 鎮羽絨總廠調查	石秀印 王漢生 劉世定 柳可白	343
K 鎮塗料廠調查	石秀印 王漢生 劉世定 柳可白	396
討論：中國鄉鎮企業的奇迹是怎樣出現的？	楊沐	436

導言

馬戎

一 課題背景

關於中國鄉鎮企業發展歷史與運行機制的研究，是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ISA）與新加坡東亞政治經濟研究所（IEAPE）的一個合作研究項目。實地調查工作是於 1992 年完成的。

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之所以在 1992 年要加強鄉鎮企業方面的研究，有下述幾個原因：

一 自 1985 年建所以來，社會學人類學所一直關注着中國農村的發展。首先，作為費孝通教授在三、四十年代農村研究的繼續（費孝通，1986；費孝通、張之毅，1990），社會學人類學所研究了 80 年代早期中國不同地區農村的發展模式（潘乃谷、馬戎，1993）；之後，隨着農村地區家庭責任制的實施以及農村出現大量剩餘勞動力，社會學人類學所研究了小城鎮發展及從農村到城鎮的勞動力轉移（費孝通，1984；鄭農儉，1987；馬戎，1988）；隨着小城鎮的迅速發展，以及以小城鎮為中介的城鄉間經濟與人員交流的增長，社會學人類學所對城鄉協調發展和中國的城市化、工業化的新模式進行了研究（馬戎，1990；費孝通，1991）。為了進一步理解小城鎮的發展趨勢，研究當代

中國小城鎮發展中最重要的因素——鄉鎮企業，便成爲一個中心課題。

二 八十年代初期，鄉鎮企業成爲蘇南地方經濟中引人注目的現象。在十年的時間裏，鄉鎮企業已經在沿海地區以燎原之勢蓬勃興起，隨後在內地甚至在中國的西部偏遠地區，鄉鎮企業也開始逐步發展起來。到九十年代初期，在政府的大力提倡下，鄉鎮企業在全國都蓬勃發展起來。同時鄉鎮企業在中國社會經濟生活中的地位也愈益重要。1991年，中國國民生產總值(GNP)的26.6%，來自鄉鎮企業，鄉鎮企業上交稅金佔全國稅收總額的15.2%(鄉鎮企業司，1993:1)^①。在1992年，GNP增長量的51.6%，稅收增長量的68.2%，國家經營的外貿出口增長量的61.7%，以及農村人均純收入增長額的61.7%，都來自鄉鎮企業(《人民日報》，1993年9月19日)。

當鄧小平說「我們完全沒有料到的最大收穫，就是鄉鎮企業發展起來了，……異軍突起」(1987)時，他的話證實了鄉鎮企業的重大意義以及鄉鎮企業的成就是國家領導人未曾料及的。與國營企業相比較，鄉鎮企業在短短時間內取得的成績確是值得令人刮目相看的。田紀雲談到「國營企業40多年來用了大約4—5萬億元，形成了1.7萬億元的固定資產，現在大體是2萬億元的產值，吸納1億多人就業。…鄉鎮企業…經過十多年的發展，到現在已形成5,300億元的固定資產，1992年總收入可達1.5萬億元，工業產值可達1萬億元，吸納就業人數也是1億。我國社會總產值從1千億元到1.1萬億元，用了31年；而鄉鎮企業從1千億元到1991年1.1萬億元，僅用了8年時間」

① 1991年全國財政總收入爲343億元，其中67.5%來自城鄉集體企業(包括鄉辦及村辦企業)，10.1%來自私營企業(國家統計局，1993:218)。

(《經濟日報》1992年1月4日)。

根據全國鄉鎮企業會議(1993年9月)所作出的預測，到2000年時我國鄉鎮企業總產值將達到7.6萬億元^①，上繳國家稅收7,500億元。此外，同期鄉鎮企業將再吸收5,000萬農村勞動力(《人民日報》，1993年9月22日)。假如這一目標能夠實現，中國非農業勞動力中的60%將在鄉鎮企業工作，那時鄉鎮企業將創造出國民生產總值的50%。鄉鎮企業在中國社會經濟生活中的重要意義也將更加突出，這是我們對鄉鎮企業及其發展投以更多的注意力的又一原因。

三 由於全國進行治理整頓，1989年後期政府在經濟方面進行了一些政策調整，鄉鎮企業也承受了一定的壓力。鄧小平指出「對那些浪費電力和原材料的鄉鎮企業，要堅決關一批，行動要堅決，」隨後即開始了鄉鎮企業的「調整階段」(張毅，1990a: 364)。與1988年的情況相比，鄉鎮企業的總數由1988年的1,888萬個減至1989年1,850萬個；鄉鎮企業職工數從1988年9,590萬降到1989年的9,370萬，1990年又降到9,260萬。但即使在「調整階段」，鄉鎮企業的總產值依然呈增長趨勢：1989年為7,428億元，1990年8,462億元，1991年更突破1萬億大關，達到了11,622億元，到1993年進一步達到29,000億元，兩年之間產值增長2.5倍(鄉鎮企業局，1992: 8-11;《中國鄉鎮企業報》1994.1.1)。因此，鄉鎮企業顯示了其頑強的生命力，這不僅表現在市場競爭中，在受到政治運動影響時同樣如此。

四 社會主義體制改革發源於東歐國家。但是前蘇聯及東

① 1991年鄉鎮企業總產值為11,622億元。這次會議為鄉鎮企業發展制訂的目標，要求在1991至2000年期間年產值增長率要達到23.2%。

歐國家實踐的是一種強調政治領域及城市的體制改革模式。相反，中國的改革策略強調了農村的經濟體制改革：首先是把農村的公社體制轉變為家庭承包責任制，然後推動小城鎮的發展，最後才轉入最複雜最困難的領域——城市國有企業的體制改革。在這一過程中，政府對於政治體制改革異常謹慎，以保持國家的政治穩定和正常的社會秩序。

現在國際上越來越多的政治家和學者都承認，中國的體制改革戰略是可行並富有成效的。人們因此很自然地會提出這樣幾個問題：(1)為甚麼中國在體制改革中更多地關注經濟而非政治體制？這一戰略是否與中國的傳統文化和治國之道有關？(2)既然鄉鎮企業在中國經濟中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而中國和前蘇聯及東歐國家在改革前具有相似的所有制形式，那麼為甚麼鄉鎮企業(或與其具有相似形式的企業)卻未能在前蘇聯及東歐國家發展起來？

五 在現階段，中國改革的重大難題是國有企業，因為國有企業擁有1億職工，加上他們的家屬，是中國城市人口的重要組成部分。所以政府在推進國有企業體制改革這一問題上相當謹慎。1990年，國有企業的虧損面高達31.4%，而鄉鎮企業的虧損面則只佔鄉鎮企業總數的8%，為甚麼在同一個國家中，一類企業面臨如此嚴峻的形勢，而另一類企業則欣欣向榮呢？中國的國有企業當然不會重蹈蘇聯國有企業的覆轍，那麼，中國的國有企業應向鄉鎮企業學些甚麼呢？深入研究鄉鎮企業或許能為我國國有企業未來的改革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鑒。

基於以上考慮，我們感到當前有必要對鄉鎮企業進行一次較為深入的研究。一方面，我們從研究鄉鎮企業的過程中所取得的知識可能會對推進國有企業改革起到積極的作用；另一方面，鄉鎮企業的發展是相當迅猛的，在鄉鎮企業內部以及鄉鎮

企業與地方社區、政府國有企業的關係等方面，每日每時都發生着變化，如果我們不能及時地記錄下來，把握住這些重要的變化，這一切都將很快成為歷史，對於學術研究也將是一個重大損失。

由於以上原因，當我們了解到新加坡東亞政治經濟研究所同樣對於研究中國的鄉鎮企業抱有濃厚的興趣時，我們雙方便開始探討就這一課題進行合作的可能性。1992年3月，我們同新加坡的合作者就該課題的細節進一步開展討論，討論內容涉及研究地點的選擇，研究的具體設計以及時間表等等，就合作達成了協議，東亞政治經濟研究所的主席吳慶瑞博士主持了這些討論，由吳博士準備的文件（「調研指南」及有關問卷）是我們進行實地研究的重要參考，同時，我們非常感謝新加坡東亞政治經濟研究所為這一研究課題提供了資助。

二 對鄉鎮企業發展及鄉鎮企業研究的回顧

在介紹我們在實地調查中所使用的方法以及這一課題所關注的重點問題之前，對鄉鎮企業的發展歷史以及有關鄉鎮企業的國內外研究文獻作出簡短的回顧是很有必要的。

1 關於中國鄉鎮企業的定義

中國農村的行政體制在改革前，實行的是「公社一大隊一生產隊」的三級體制，一個縣可能擁有8—15個公社。大約在80年代初，這一體制演變為「鄉（或鎮）—村委會—村民小組」的新三級體制。與從前的公社相比，鄉在人口規模和地域面積上都要小一些，在改社建鄉的過程中，通常一個公社分作兩個鄉。鎮和鄉在行政上是同級的。當一個鄉達到了一定的標準（非

九十年代中國鄉鎮企業調查

農業人口佔總居民數的比重、工業產值)，鄉就有資格申請撤鄉設鎮(即「建制」鎮)，鎮擁有一些鄉所不具備的權益(參見馬戎，1990；Ma，1993)。

按照官方的定義和統計，鄉鎮企業包括「由農民創辦的集體、合作及私有企業」(鄉鎮企業局)。具體地說，鄉鎮企業包括(1)鄉(或鎮)辦企業，(2)村(村委會)辦企業，(3)幾個家庭(聯戶)合辦的企業，以及(4)私有企業。1991年按所有制形式區分的鄉鎮企業的生產情況見表1。儘管私有企業的從業人數眾多(約佔鄉鎮企業從業人員總數的50%，其中許多是家庭經營企業)，鄉(鎮)及村辦企業的產值卻遠比這類企業多得多。

表1 鄉鎮企業產值的所有制結構

單位:億元

年	鄉(鎮)辦企業	村辦企業	聯戶企業	私營(個體)企業
1978	281.7	213.4	—	—
1979	310.6	241.6	—	—
1980	373.0	292.1	—	—
1981	417.0	319.7	—	—
1982	479.6	366.7	—	—
1983	572.7	435.2	—	—
1984	808.6	645.2	126.5	117.5
1985	1,160.6	913.1	245.0	436.4
1986	1,446.9	1,109.4	314.1	712.8
1987	1,897.2	1,460.5	446.2	1,141.7
1988	2,667.0	2,067.9	591.4	1,691.5
1989	3,093.0	2,489.3	682.0	2,137.5
1990	3,431.6	2,822.2	726.6	2,600.7
1991	4,274.5	3,445.3	755.5	3,146.1

資料來源：農業部鄉鎮企業局，1993年12月。

表2反映了鄉鎮企業的主要經濟指標，以及鄉鎮企業的職工數在不同時期的變動情況。由表2可以看出鄉鎮企業的基本